

2019.03.09 《经济学人》中国区域报道之中译

本期导言：因不可抗力，公众号“经译求经”在第一期内
容刊载后，仅存活一小时即告夭折，因此，自本期开始，本
刊只好四处“打游击”。让我们有缘相见于江湖。

本期翻译：吴译凡、罗轻舟、不慢

轮值编辑：不慢

如需订阅，请发送邮件至电子邮箱
luoxiaojian1986@gmail.com 说明。我们将为您发送每期译
文。



经译求经

目 录

1.新的论调	3 - 6
2.多事之春	7 - 9
3.当中国赞美民主之时	10 - 14

中国经济：

新的论调

吴译凡 译

政府本年度财政计划摒弃刺激方案。

年复一年，中国那橡皮图章般的议会（全国人大）看起来像是一成不变。3月5日上午9时许——日期和时间照旧——李克强总理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作年度政府工作报告（在此之前，代表们在军乐队伴奏下齐唱国歌）。与以往一样，李总理的报告耗时近两小时，他回顾了去年政府在经济增长、投资、就业等诸方面的目标，也宣布了一系列新的目标。去年的目标已经达成，今年的目标也必将实现，正如腰背笔挺的仪仗队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地在天安门广场升起国旗。报告的结尾，李先生照例振奋人心地承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代表们全程有模有样全神贯注地听，这时都交差一样地鼓掌。（参见本期茶馆专栏）

尽管开会时行礼如仪，发言时言辞老套，李先生的讲话中却有相当的新政策和新数字，凸显出中国各方面（包括政府自身）在经济上的面临的不确定性。这份透露着谨慎的报告，标志着全国人大今年为期十天的会议正式开幕。李先生表示，中国今年GDP增长率的预期值将处于6%到6.5%的区间，低于2018年6.6%的水平。当然，对中国这种体量的经

济体而言，如此增速仍属强劲，但这将会成为近 30 年来最低的增长率。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官方数据夸大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步伐。（参见本期财经部分）

部分细节更能一窥端倪。李先生宣布，经济政策将以“就业优先”为中心：政府今年争取将（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 5.5% 以下，并为失业人员提供培训。官方失业率数字一直都维持在 5% 左右，但制造业及科技企业近期已开始裁员。大概是唯恐老百姓认为，一些人在过紧日子，当官的却在胡吃海喝，李先生下令公职人员将“三公”经费（因公出国、公车、公务招待）压减 3%。

他同时承认了民营企业正遭遇困境。在过去一年，一些企业家越发感到不踏实，担心政策会对其不利。李先生的讲话，有一部分目的就是要扭转这样的印象。他指出，地方政府是该问题的肇因之一，很多（地方政府）拖欠承包商的款项。他承诺帮助民营企业获得贷款，而这个难题让一些企业家叫苦不迭。他认可与美国的贸易战有损于某些企业的看法——对中国领导人来说这算是直白的承认了。

而重大的经济问题是，政府的关切对其财政及货币政策意味着什么。在过去十年间，每当增速放缓，中国的对策总是斥巨资兴建基础设施，鼓动银行增加贷款。但这一次，这方面的信号没那么明显。

在此次人大会议之前，一些观察人士曾认为，中央政府

又要祭出老办法。因为在去年底，其（中央政府）计划机构（译者注：此处应指国家发改委）就在通过快速程序审批新的基建项目。各家银行仅 1 月份就发行了 3.2 万亿元（4770 亿美元）贷款，是为单月之最。股市投资者对市场看涨，沪深 300 指数（中国大企业的股票指数）飙升近 30%。

但实际上，相比以往，领导层对刺激政策更为慎重，他们担心债务杠杆已经很高了。在 1 月份贷款激增后，李先生曾警告说这有可能对经济产生“新的潜在威胁”（央行曾反驳称，相关增长是由于季节性原因）。数月以来，李先生一直在反对他所谓的“大水漫灌式的刺激”。在（政府工作报告的）讲话中，他又再次提及这一说法。他还 24 次提到了“风险”一词，其次数为过去十年间政府工作报告之最。他说，风险可能源于金融的脆弱，源于地方政府的靡费，也可能源于外部环境（例如与美国的贸易战）。他向官员们传递的信息是：做最坏的打算；给投资者的信息则是：别指望政府再次大规模增加财政开支。

但执政党仍在探索提振经济的路子。简单地看，有一项不需要修路建桥，又可以得人心的政策工具：减税。李先生此番披露的减税目标大都针对企业，总额近 2 万亿元（人民币），超过预计 GDP 的 2%。汇丰银行经济学家称其为十年来中国最大范围的企业税减免。今年，财政赤字（含地方债券）将攀升到 GDP 规模的 5% 左右，高于 2018 年的 4.1%。

然而，这与往昔的刺激方案大异其趣。政府仍避免采取强化楼市的措施，而这类措施在过去的刺激经济中毫无例外地出现。

中国举棋不定的一大原因是与美国的贸易战。目前，不少人认为（中美之间的）协议只是时间问题。据报道，两国已经进入到磋商的收官阶段。在此次会议期间，全国人大将审议通过一项外商投资法，其目的正是回应美国一些主要的指控——例如将禁止要求外国投资者向中国公司转让技术。即便外界对中国将如何执行这部法律有所质疑，但它至少是缓和贸易冲突的一种尝试。

本月，美中元首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有可能举行会晤，见证有关协议的正式签署。但中国的官员们很清楚特朗普先生之善变。因此他们在制定经济政策的时候，将试着给自己留后路。如果贸易战的问题解决了，则可以保留财政方面的实力；如果情况恶化，则有增加开支的余地。中国的进退，部分取决于美国总统是否反复无常。

青藏高原：

多事之春

罗轻舟 译

随着众多纪念日的陆续临近，警戒队伍正在密切监控西藏方面的动向。

红崖村坐落于青藏高原边缘的青海省西部的一处山坡上，村外的临时检查站配备了四名壮汉警察。其中的一名警察说，红崖村的访客必须要将身份证件交给警察拍照并登记姓名。红崖村是现任的达赖喇嘛即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出生地，他是流亡在境外的西藏精神领袖，为中国政府所憎恨。他的故居被亲友当成圣地保护起来了，西藏的信徒时常涉险来到这里。但是现在，至少红崖村禁止了未经批准的外人进入。

红崖村时常防范森严。但在官方有时称之为“敏感月份”期间，整个青藏高原包括西藏和其他省份的藏族人聚居区域的官方都处于高度警戒状态。今年，敏感的纪念日接连不断，官方担忧这些纪念日可能触发藏族人反抗活动。其中之一是3月14日，2008年的3月14日西藏首府拉萨爆发了反抗中国人的骚乱，引起整个青藏高原范围内广泛的动荡，并招致了官方的激烈镇压。

除了3月14日外，许多藏族人最痛苦的记忆里的那一天已经过去了60年了：1959年3月10日，官方对拉萨发生

的反对中国统治的起义进行了镇压，一周后达赖喇嘛潜逃到印度后镇压局面进一步升级。并没有什么迹象显示这个春天会有另一场类似的大规模的反抗爆发。但是中国官方常说的是，危机管理要防微杜渐。过去十余年间，据信有超过 150 名藏族人，其中许多是僧侣，以自焚的方式抗议中国当局对达赖喇嘛的指责，以及藏族人视之为中国压制其文化的政策。亲西藏的团体已计划在纽约、德里发起示威游行纪念 1959 年的起义。

靠近青海省会西宁市的塔尔木寺是藏传佛教的重地之一，该寺还以被视为对中国政府最忠心耿耿的寺庙之一而闻名。但对它的防范亦未放松。当有人向寺里的僧人打招呼时，这些僧人会在紧张地四下张望附近的警察和头顶上密集的监控镜头后，才以寥寥数语客套地应付了事。很久以前塔尔木寺就有警力据点。自从 2008 年的动荡后，当局在更多的寺庙里推行了这项安排。

无论如何，外国人现在还被允许待在青海省。从 2008 年开始，每年三月西藏都要对外国游客关闭几个星期。因前述的 60 周年纪念日的缘故，今年西藏的关闭禁令可想而知要比往年更长一些（外国记者和外交官几乎不能进入西藏）。今年 1 月，西藏公安厅厅长张洪波讲到西藏今年的大型纪念日存在“许多危险和潜藏的威胁”，这些纪念日包括 10 月 1 日的共产主义中国建国 70 周年。他的结论是，维护西藏稳

定的任务将会“越发严峻和复杂”。3月2日，张洪波动员他的部属在这场“严酷的战斗中”要“为赢得胜利而坚决战斗”，以确保这个月西藏的安全。中共官员甚至担忧自己阵营内部的人的异议。在最近的宣传视频中，西藏自治区政府痛斥共产党内的“两面人”党员秘密为分裂主义者提供帮助。

不过，三月有中共自己想要庆祝的纪念日。这个日子是3月28日，1959年的这一天中国解散了达赖喇嘛领头的西藏政府，中共称这结束了僧侣控制普通民众的压迫制度，不过海外的藏族人却说中共言过其实了。今年是这一天被中共方面宣布为“农奴解放日”的第十年。官方以歌舞表演来纪念每年的这一天。近期官方媒体充斥着对西藏“民主改革”的赞扬、农奴解放日给西藏带来了现代性以及藏族人感恩戴德的内容。然而，遍布青藏高原的步步为营的警戒队伍的存在勾勒出一幅非常不同的画面，那就是中国官方心知肚明，藏族人并没有心情强颜欢笑。

茶馆专栏：

当中国颂扬民主之时

不慢 译

中国的统治者在吹嘘其问责制的拙劣宣传中泄露了玄机。

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那吃闲饭的阉割版议会——让外国记者备受考验。尽管其常委会有时会提出修订几部新的法律，或是承担部分外交职能与外国立法机构接洽，但 3000 多名代表参加的大会大部分时候都很沉闷。实际上，这个议会从未否决过共产党领导人提出的任何“建议”。外国记者常常会感到困惑，到底要不要参加这样的年度“宣传秀”。在领导人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外国记者会被安排在上佳的座位上，需要预先提交问题，但这些问题很少被抽中回答了。如此之安排使得官办媒体向国内观众展示全世界的媒体人高举手臂、热切要求参与这个假冒的代议制民主活动的场景。

“两会”期间，立法机关（译者注：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充斥着企业老板、学者、体育明星、宗教领袖以及其他社会显要的资政机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同时召集，北京的安保工作牢牢占据了制高点。值得注意的是，网警中断了帮助人们翻越用于网络审查的“防火长城”的 VPN 服务。对于外国记者来说，在“两会”这场大戏中，他们常常

需要猜测自己能否使用互联网来发送他们关于政府责任的新闻。

最后，他们还会经历一样怪事——就是同被中国官办媒体或是那些来历不明的专注于从事中国宣传的“西方”媒体所雇佣的外籍媒体人会面。他们表面看是同行，但实际上完全是两类人。这些人有的会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出举办方安排好的问题。其他人则会突然出现在中国的官办媒体上赞美中国的政治体系。中国的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今年推出了一条名为《听美国小哥给你说说中国民主制度》的视频。一位来自芝加哥的面带稚气的年轻人科林·林纳韦伯（Colin Linneweber）一边在天安门广场上闲逛，一边侃侃而谈：“众所周知，中国的成功得益于它特有的民主制度”，并赞扬了中国的稳定。然后他展示了代表们的履职简历，他们的本职工作是农民、农民工或者快递员，他们的提案都变成了法律，让中国变得更加美好。这种西方人着实让人气愤。如果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在这个冤魂无数、被警察严密监视的广场上赞美民主，他会立即被逮捕。而且，稳定自有其代价。中国的一党专制不仅仅是缺少那种看上去混乱的真实选举和新闻自由。它还需要依靠国家安全机关一刻不停地积极作为来维持。他们对任何挑战共产党垄断权力的人进行追踪、威胁，或是直接将其投入大牢。

早在中国内战时期，党的领袖就自称民主人士，以便区

别于其搞独裁的对手国民党。1945 年毛泽东向身为商人和教育改革家的黄炎培提出，民主可以帮助共产党政府跳出封建王朝无法摆脱的“兴亡周期律”，这一主张让中国的知识分子耳目一新。毛泽东宣称，“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黄炎培最终意识到自己当时对毛泽东的判断错得有多离谱。1957 年，在他亲眼目睹之下，共产党开始攻击自己的儿子黄万里，他是一位工程师，曾就黄河上一座规划中的大坝存在的缺陷提出了警告。他的警告无人理睬，于是这个年轻人在一篇文章里写道，美国人民可以让官员下台（译者注：此处指黄万里于 1957 年 5 月，在《新清华》发表的散文《花丛小语》，其中提到“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毛泽东看了《花丛小语》一文后，批评黄万里这是什么话，把美国的月亮说得比中国的圆）。于是他被打成了“右派”，并被送去劳改。

毛泽东死后，当改革开放下的政治自由无法与其经济上的开放相衬时，党的领袖开始为他们的选择辩护，他们企图使外国人确信，只有牢牢地控制住这样一个大国，才能避免混乱。20 世纪 90 年代，政权交到了江泽民手中。江泽民是一个西方文化的仰慕者，喜欢引用亚伯拉罕 林肯（Abraham Lincoln）关于政府“民有、民治、民享”的宣言。当一位美国采访者问他中国是否实行的是专制统治时，江泽民先生答

道，他是经过选举的实行集体领制的政党的首脑，但这一选举需要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

而现如今，外国人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中国，连这种敷衍的道歉也听不到了。习近平宣称中国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以党全面领导下的人民“有序参与”为特色。今天，官办媒体大肆宣扬中国的政治制度比西方那种“矛盾重重”，被金钱玷污的政治更加有效。最近的美国政府关门、英国脱欧引起的混乱，以及法国的黄马甲骚乱，在中国都成为了西方衰落和失败的例证。外国人同普通的中国人讨论政治是自讨没趣。在确认茶馆专栏是英国媒体后，北京的一位自行车修理工嘲笑道：“就你们那首相，梅？真是一团糟，不是吗？”

让人民的声音被倾听

在中国进行民意调查很难。因为直抒胸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但国立台湾大学经营的《亚洲民主动态调查》仍先后四次询问了中国公众对于民主的看法。政治学家岳英（音译）在《台湾民主杂志》中撰文写道，接受调研者中微弱多数支持以稳定为名的新闻审查制度，三分之二能接受一党制。但问责制是人们关心的话题，接近 80% 的受访者拒绝接受“专家决定一切”的政府，同时有 60% 的人提出应该允许公众批评当局。

这为人们理解科林·林纳韦伯的那部把中国的立法机构

吹嘘成民主灯塔的宣传影片提供了新的途径。这种影片其实是在称赞西方。一个美国人关于责任政府的观点之所以举足轻重，是因为一般的中国人都知道美国的投票者能够把混蛋从政府里赶出去。如今，中国的统治者仍然介意有人拿西方的标准来批评他们的威权体制。等到有一天，他们认为已经不再需要科林·林纳韦伯们时，那才真的需要开始担心了。